

再论马尔萨斯

王存同

【摘要】 文章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本原理入手,运用数理方法证明“两个级数”推断的合理性,并对“两种抑制”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人们对“两种抑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同时,对“人口决定论”、“鼓励战争论”、“反济贫论”等多年来的曲解与批判也展开讨论。文章认为对《人口原理》应进行系统研究,挖掘其合理成分,公允评价马尔萨斯。

【关键词】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解读 评价

【作者】 王存同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由于18世纪的欧洲人口增长加速,人口问题首次成为社会的焦点。1798年,32岁的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第一版,反响巨大,学术界与大众开始关注人类历史上贫困现象的比较及不同人口过程在决定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时的重要性,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人口变动过程与后果的认识,但争议迭起。该书第二版于1803年署名出版,由一本小册子变成篇幅大4倍的巨著,被誉为人口科学的开山之作。此后,马尔萨斯又先后6次修改出版,各家争论更为激烈,至今未衰,《人口原理》遂成为社会科学史上争议最多、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李宗正,1992)。

有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国学者简要概括为“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与“两种抑制”(刘铮等,1986):(1)两个公理。也称为“两个假设”,即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恒状。这“两个公理”是马尔萨斯得出结论的两个基本前提。(2)两个级数。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增殖之间不平衡,前者要大于后者。(3)三个命题。根据“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马尔萨斯推出三个命题:人口增加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抑制;某种抑制使得现实的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4)两种抑制。传统译法为“预防抑制”与“积极抑制”。即一种通过限制结婚等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存在于近代欧洲,称之为“预防抑制”;另一种为人口无节制的增长直至日益增长的贫困导致死亡率上升,存在于非近代世界和欧洲以外的地区,称之为“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也反响巨大。20世纪初的《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等曾发表或出版文章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从30年代初至今,研究与论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作品不胜枚举。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长年争论不休,

《人口原理》第一版的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第二版的书名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

基本上是否定派占绝对优势(王建华,1992)。如张福生、沈斌华(1993)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辨析》全面否定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网络搜索引擎“百度”中“马尔萨斯”词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充分体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本质。该理论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认为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赶不上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需要,并认为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抛开了社会制度,抽象地从生物属性和脱离现实的假设来说明人口规律。”

尽管近年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已由全盘否定到部分肯定并开始重新评价,但对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认识与评价还受到一些历史的影响与局限,长期的误解、曲解也削弱了对《人口原理》积极的探讨。如何评价、解读马尔萨斯,事实上也关系到对所有学者、学术的评价问题,更关乎学科的良性运转。若抛开阶级性、政治性等因素,仅就作品的科学性、价值性、历史性而言,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不乏真知灼见。

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剖析

(一)“两个级数”推断的合理性

人们常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便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精要之所在(王健康、万高潮,1997),并认为“两个级数理论是反科学的”。也有学者指出,“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论,不但完全抹杀了两种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抹杀了历史的事实。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片面性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其实,马尔萨斯明确指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动植物以算术级数增长并不是一般规律,只是一种假设前提成立下的外推。他说:“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动植物的巨大繁殖力按什么比率增加,如果没有其他障碍妨碍它们,必定以几何级数增长。”“有人说,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其数量会在25年内翻一番,而且只要有足够的空间,人类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使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地方都布满人。但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倾向不可能成为自然法则,因为实际存在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必定包含着与事实和现象很难调和的过高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毁灭。”文中还多处强调“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级数增加。”不言自明,“人口若不受抑制”是人口按几何比率增加的前提条件,两个级数的存在只是在这种假设条件满足时的结果。可是,人们在批判“两个级数”时,却有意或无意把这个前提忽略了,而用全球或中国实际人口增长率与食物增长速度进行对比,以证明他的结论是错的,可能会失之偏颇。所谓“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比率增长”,这种局面仅仅是就“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而言的一种抽象可能,只是数学上的一种推断,而非必然。那么,这种推断是否合理呢?笔者试推导如下。

众所周知,从时点变动角度考虑,人口变动公式为:

$$P_{(0-t)} = P_{(t)} - P_{(0)} \quad (1)$$

其中, $P_{(0)}$ 为起始年的人口量, $P_{(t)}$ 为 t 年后的人口量, $P_{(0-t)}$ 为从起始年到 t 年的人口增

参见“百度”百科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63506.htm>)。刘铮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人口理论教程》中也有相似论述。

孙连成:《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问题》,《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

史国藩:《给马尔萨斯人口论再评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本文引文除特别注明著者出处外,其他均引自朱泱等中译本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量。若从人口过程变动的角度考虑,则可将式(1)写为人口变动平衡方程:

$$P_{(0-t)} = (B - D) + (I - E) \quad (2)$$

其中, B 为出生人数, D 为死亡人数, I 为迁入人数, E 为迁出人数。即人口增量为人口自然增长与迁移增长人数之和。

将式(2)略作变化,可得:

$$\frac{P_{(t)} - P_{(0)}}{PY} = \left(\frac{B}{PY} - \frac{D}{PY}\right) + \left(\frac{I}{PY} - \frac{E}{PY}\right) = \frac{N}{PY} + \frac{M}{PY} \quad (3)$$

其中, PY 指人年。

已知人口粗增长率为: $r_{(t)} = \frac{P_{(t)}}{P_{(0)}t}$,当 t 趋近于0时,可求得:

$$r_{(t)} = \lim_{t \rightarrow 0} \frac{\frac{dP_{(t)}}{dt}}{\frac{P_{(t)}}{t}} = \frac{d \ln [P_{(t)}]}{dt} \quad (4)$$

其中,测量单位为年, $r_{(t)}$ 为年增长率,它反映了在时间 t 时人口瞬时增长率。当具体时点为起始年到确切 t 年时,公式(4)可整理为:

$$\int_0^t r_{(t)} dt = \int_0^t \frac{d \ln P_{(t)}}{dt} = \ln P_{(t)} \Big|_0^t = \ln \left(\frac{P_{(t)}}{P_{(0)}} \right) \quad (5)$$

对式(5)两边取指数,则: $e^{\int_0^t r_{(t)} dt} = \frac{P_{(t)}}{P_{(0)}}$,再整理得:

$$P_{(t)} = P_{(0)} e^{\int_0^t r_{(t)} dt} \quad (6)$$

就广义而言,人口指数增长是在任一不确定单位时间内以一个固定的年增长率来计算 $P_{(t)}$ 的结果。就实质而言,几何增长只是指数增长的特例,如2,4,8,16,32,64……,类似等比数列。这样一个结果被马尔萨斯较为准确地描述成“几何增长”或“以某一种固定的增长率变化”,即 $r_{(t)}$ 可以看做常量,以 r^* 来表示,公式(6)可简化为:

$$P_{(t)} = P_{(0)} e^{r^* t} \quad (7)$$

数学公式推导至此,恰好验证了马尔萨斯“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级数增加”的正确性。这一定理曾在欧洲人口史特别是英国人口的变迁考察中得以实证(李中清、王丰,2000)。对于实际人口变动而言,由于外生变量过多,如有限的生存资源及空间、生产力水平、文化水平、传统意识等,而不能简单假定出生率对于时间来说是个常量,再行套用“两个级数”会有欠精确,但尚能描述人口总量的大致变化。“两个级数”的观点不仅启迪了达尔文“生存竞争”的机制,也为“进化论”提供了数学逻辑上的基础(张洪方、王林山,2006)。虽然这个定理在今天看来过于简单,但它开创性地探讨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相协调的人口规律问题,并对人口变动进行了科学的定量解读,影响深广。如生命科学中最基本的定律就是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而许多现代人口模型或指标测算也多在“两个级数”的基础上进行了推广应用,如马尔萨斯 Logistic 模型、马尔萨斯经济增长模型、银行信贷利率的马尔萨斯增长模型、冈波茨(Gompertz)生育及死亡模型、总和生育率的测算等。

(二) “两种抑制”的内涵解读

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两种抑制”一直受到各方面的严加指责。两种抑制,即“预防抑

参见刘铮(1986):《人口学辞典》相关词条及许涤新(1979)《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

制”(preventive checks)与“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一种是通过限制婚姻等方式来控制人口增长,存在于近代欧洲,马尔萨斯称之为“预防抑制”;另一种为人口无节制的增长直到日益增长的贫困导致死亡率上升,存在于非近代世界和欧洲以外的地区,马尔萨斯称之为“积极抑制”。关于“预防抑制”,有学者认为“马尔萨斯也主张晚婚、节育,以限制人口的繁殖。他的这种主张,在表面上、形式上似乎同我们的有计划发展人口的政策有点相似,但是在目的上、在作用上,那是迥然不同的。马尔萨斯是把晚婚、节育,作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等所谓决定性因素的补充”;关于“积极抑制”,有学者认为“马尔萨斯提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是减少人口,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不但千方百计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劳动人民带来的无限灾难,而且公然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这些灾难作为治世良方”。

其实,从马尔萨斯的本意来说,“两种抑制”只是两种理想的人口过程模型:一种主要取决于死亡率,他称之为“积极抑制”;另一种主要取决于结婚率与出生率,他称之为“预防抑制”。“积极抑制”的人口伴随着持续贫困,而“预防抑制”的人口则走向繁荣。马尔萨斯分析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数据,证明第一种人口过程是人类多数历史上,包括当时的非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第二种过程则仅仅是“现代”欧洲,特别是英格兰的特有现象(李中清等,2007)。他从实证出发,认为推迟婚姻等预防性抑制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更可取的手段,可以通过道德抑制的方式来实现,表现为个人决定直至有能力承担养家糊口之责时才结婚。推迟婚姻不仅能鼓励个人储蓄并制约贫困,而且通过制约人口增长,使劳动力的价格保持在水准,繁荣局面得以维持(李中清、王丰,2000)。

就“积极抑制”而论,马尔萨斯的本意是说贫困和罪恶等原因可降低人口增长态势,这只是“或多或少地对已往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性现象”的事实陈述,而决非他本人的价值判断,也不说明他欣赏或者主张以此类手段来抑制人口的几何增长(王健康、万高潮,1997)。乔晓春(1994)指出,“积极抑制”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说由于人口过多,若生活资料供给不足,就必然要死掉一部分人;其二则是说已死去的人本身采取了什么形式,如饥荒、瘟疫、战争等。这里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一种意思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一事件本身会引起一定的死亡”,这是合理的;另一种意思是“如果统治阶级自己认为人口过多,从而人为地通过饥荒、瘟疫、战争造成一部分人口死亡”,这是错误的,必须进行批判。

就《人口原理》而言,马尔萨斯主要表达的还是第一种意思。他本人坚决反对以罪恶和贫困等手段来消灭过剩人口,并认为这一类主张“是一种一刹那也不能容许的思想”。相反,“罪恶和贫困,也只有这些,是我的主要斗争对象。”他还特别强调:“我并没有认为由于人口过剩而出现的罪恶行为和贫困等等不幸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减轻的。相反,我曾经指出一种通过消除或减轻原因来消除或减轻这些不幸的方式。”恩格斯对此是充分肯定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育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

Positive checks 在这里暂采用传统译法——“积极抑制”,较为适宜的译法应为“现实抑制”或“事后抑制”。

许涤新:《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1979年第1期。

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提出人口过多会导致饥荒、瘟疫、战争的增加从而增加死亡,就认为是主张用饥荒、瘟疫、战争来消灭人口,这是一种理解错误。

就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的人口态势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明智而卓有成效的。政策倡导人们实施家庭计划,并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鼓励人们有意识地对生育子女进行成本核算,大力推广避孕节育,提倡晚婚晚育、增加生育间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预防性抑制暗相耦合。同样,在当代社会中,“积极抑制”也没有完全消亡,只不过方式更为多样,并呈隐性与显性交替,其后果同样惊人。如慢性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AIDS)等导致的人口死亡是采取非突发性的、隐性的、渐进的方式,而非典型肺炎(SARS)、海啸、热带风暴、地震等却以显性的方式导致大量人口的瞬间死亡。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一次性遇难者总人数逼近30万。应当指出,马尔萨斯限制穷人不婚不育是不公平的,也是不人道的。但他提出的“两个抑制”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科学的、合理的内涵。

引起人们对“两种抑制”产生误解与曲解的原因种种,但其中关键语汇的中文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正确解读。如所谓“积极抑制”的原文是“positive checks”,此种译法广为流传。若按字对字译法译为“积极抑制”,并不为错。但细究之下,恐未“达”其意。若以中文字意来看,“积极”的含义是肯定的、正面的、进取的,与“消极”相对,多用于抽象事物,而原文中“positive checks”则是指贫困、饥饿、瘟疫、罪恶、灾荒、战争等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现存人口与实际的生活资料相适应。可以想见,这种方式残酷无情、有悖于人道,又怎么可以标为“积极”的呢?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蕴含不同的文化差异,并非完全字字对应,尤其一词多义的现象比较普遍。笔者倾向于穆光宗的译法,即译为“现实抑制”或“事后抑制”。因为这种事后调节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调节机制。马尔萨斯只看到了这种可能的后果和事实,没有包含他的主张,所以实际上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并没有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人口研究》编辑部,1998)。

另一种抑制为“preventive checks”,是指通过禁欲(不婚)、晚婚、不育等预先的手段减少人口增量,常译为“预防抑制”或“道德抑制”,比较恰当。依马尔萨斯原意,两种抑制呈时空变换,即预防在先、现实在后。若将“positive checks”译成“积极抑制”,与之对应的应是“消极抑制”而非“预防抑制”。应当指出,在各种中文译本中,其他误译现象或值得商榷之处也颇为多见。

(三) 关于“人口决定论”的论述

多年以来,批判马尔萨斯的首要罪名就因为他是“人口决定论”的始作俑者,认为“马尔萨斯以及其他资产阶级人口决定论者是把人口作为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以至于一提马尔萨斯,就让人本能地联想“人口决定论”。所谓“人口决定论”,即人口决定社会发展,把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但仔细推敲《人口原理》英文版6个版本及朱泱等中文译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出现过“人口决定社会发展”的描述。几个版本的确都在强调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或者说人多也是坏事的一面。从语气上而言,第一版中语气较强,但在第三版中已完全趋于客观平和。在论述其核心命题时,他指出:“人口增长必受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参见 <http://www.sina.com.cn> (中国新闻网,2005年2月4日)。

参见刘铮:《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其他人口学教科书中也有相似陈述。

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长,人口必增长”,“人口增长须适应生活资料”。很显然,他并未言及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他只是认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着人口生产。

在阅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时,就会发现恩格斯曾把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两种生产”决定社会生产,人口只是其中之一。虽然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历史上也曾被否定过,但自1978年后,中国人口理论工作者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并把它作为指导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

(四)“鼓励战争”与“反济贫论”的误读

马尔萨斯长期被认为是主张用战争作为“积极抑制”来消灭过剩人口,以达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王放勋,1978)。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谬论的基础是人要吃饭,人要生孩子,粮食生产慢,人口增长快,粮食永远满足不了人的需要,饥饿贫困是不可避免的,只能由战争、瘟疫来杀伤消灭人口或道德抑制来减少人口。”

其实,马尔萨斯只是根据“两条公理”引申出人口与食物两种不同的增长比率,即“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只是两条假设成立的外推结果,也即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能误读为他“主张”通过罪恶与贫困来消灭过剩人口(冯立天,1998)。他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就明确提出:“尚待研究的是,能否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的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说明他在积极思索与探求摒弃罪恶与贫困的另一抑制途径。接着在同一版中便提出了预防抑制,他说:“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若不看其预防性抑制,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积极抑制”,进而得出马尔萨斯是“战争贩子”的结论,可能会有断章取义之嫌。

再看马尔萨斯对战争的描述:“在人口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会以加强的力量发生其作用。关于性方面的邪恶习惯将更为普遍,婴儿的遗弃将更为寻常,战争和流行病的可能性和致命性将会大大增加”,也只不过是在说明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最大限度时,战争作为“积极抑制”的一种方式,其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而已(周雄兵,1998)。当《人口原理》第四版于1807年出版后,当时的经济学家魏兰德和杰姆士·格兰哈姆分别出版了《人口和生产原理》、《人口原理研究》两部著作,再次斥责马尔萨斯把罪恶和贫困看做是对人口过剩的“慈善救济”。马尔萨斯对已持续14年之久的这类指责感到极端无奈和厌烦,他在第五版附录中声明:“这是我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倘若今后还有人继续此种说法,我将对这种说法和提出之人置之不理。”他再次重申“罪恶和贫困是我的主要斗争对象。我曾明确建议用道德抑制作为消除罪恶与贫困的手段。无论这个手段是好还是坏,足够或不足够,这个建议本身和我对它的重视,是我从来没有把罪恶和贫困本身看成救济手段的无可争辩的证明”。

有学者认为,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反对社会改革,主张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孙连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

吴斐丹:《用计划生育来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1982)。其实,马尔萨斯本意并非如此。他认为,改善贫民境遇的方法,一是通过“预防抑制”减少过剩人口;二是“鼓励人们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不是畜牧”;三是“各郡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马尔萨斯持积极的应对态度,提倡穷人增强“自体供血”功能,实现持续发展,无形中也体现了马尔萨斯作为一个真正学人具有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从绩效评估的角度来阐述济贫法的缺陷,认为从实际结果看“济贫法的确曾和缓一时的严重困苦;若综合一切情况来考察,受教区维持的贫民并没有因此免去贫困”,“该法案同所有这类法案一样,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有助于增加人口,却未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不靠救济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恶化,造成更多的穷人。”

综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实施的扶贫开发战略,一改20世纪70年代的“金钱扶贫”、“物资扶贫”等纯粹补助型、消费型的扶贫方式,注重提高帮扶对象自身的科技能力、文化能力与致富能力,让帮扶对象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培养与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挖掘与激发他们自身的潜能,提高其自助能力,使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讨论与建议

(一) 提倡系统研究,坚持客观真理

中国对马尔萨斯的研究与批判,过去以经济学界为主流,多从经济学或政治阶级视角把马尔萨斯的各个观点单独出来进行批判或研究。由于中国人口学起步较晚,因此从人口本身的运动规律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学者较少。科学史表明,不同的学科自有不同的研究视角,亦有不同的验证体系。一种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上也许是对的,但有可能违背了人口规律;相反,在经济学上被否定的理论,也许从人口学角度上看是正确的,因为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口运动也有一定的内在机制,仅仅简单地、直观地认识人口问题必然导致错误(乔晓春,1994)。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其中的一个观点可能是另一个观点的前提,也可能是另一个观点的结论,把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分开研究本也无可厚非,但决不能单单拎出其中一个观点做研究、以一个观点来替代整个有机体,这是系统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社会科学测量常识告诉我们,用一组特别的、狭窄的概念来看待或解释所有事物,会发生一定的简化谬误(Earl Babbie,2004)。例如,若把“两个级数”作为整个理论的前提或系统的一部分,很多学者就不会对其进行一些过于简单的批判。科学研究往往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出理论前提,然后把各个前提进行综合,最后才得出结论。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实际上也是一个完整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必要步骤,不管如何非难,但先建立一个前提然后去演绎结论在逻辑关系上是无可非议的。而所谓“公理”是指在一个演绎系统中,不需要加以证明而作为出发点的真命题。如欧几里得几何系统中所述的公理:(1)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2)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3)等量减等量,其差相等;(4)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

参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坚在2007年“东盟与中日韩国家扶贫官员培训班”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5/26/content_6156519.htm)。

的;(5)整体大于部分。也就是说公理是指那种无需通过证明而被人们公认为正确的判断,它的明显特性在于具有“常识性”。若承认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是“两个公理”,就意味着无需证伪。

客观地评价学术著作,其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公平、公正、正义等现代文明价值观基础之上。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自觉选择的学术氛围变迁的方向性问题,同时涉及价值观与历史观判断,以科学理论的解释与预见功能的发挥为核心,藉以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作为评价者不仅要具有浓厚的学术功底与专业素养,还要具有历史的眼光、摆脱当下政治的勇气及超前的学术意识(仲明,2004)。此外,评价学术著作的标准是真理,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标准,即使存在任何间接标准,它也必须在与客观标准等价(必须经过实践验证)的前提下才称为“标准”(乔晓春,1994)。

(二) 还原历史语境,公允评价前人

评价历史人物,应考察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或对整个人类贡献了什么新思想、新理念及开拓了什么样的处女地。年仅32岁的马尔萨斯以独到之见解,前所未有的向人类社会自发的人口繁殖亮出了“黄牌”,为后人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贡献的首创意义就决定了他在社会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200年来这个身份不算显赫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受到忽视或无法真正回避。

诚然,马尔萨斯作为“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囿于他所处的语境,无法摆脱时代或阶级的局限性,因此,对马尔萨斯的解读,宜语境化、历史化,并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场域”之中。作为一个特定“场域”中的个体,处于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其思想智识不可能不受他当下“文化场域”的相互作用而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地影响着其理论的运作与形成,难免会有错误,难免会受到指责。如他于1803年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现实性抑制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毫无预防抑制的最好范例。其实这种论断是完全错误的,主要是他成书时所收集到的中国人口相关资料极其片面所致(李中清、王丰,2000)。

其实,由于历史原因或学术取向而批判马尔萨斯也无可非议,只是某些学者沦为“棒手”、某些学者作“壁上观”,而根本不去观望与探究思想之精髓。更有甚者,本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却上升为阶级对立,从而进行人身攻击,恶语相向。无论“两种抑制”听起来是多么“残酷”,但马尔萨斯的出发点却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为了追求真理的生命意义。作为马尔萨斯的主要论战对手葛德文如是说:“我对《人口原理》的作者抱有真诚的赞许和敬佩,其论据的风格充分说明作者思想上的正直豪放。他与人进行争论,好像是除了研究证据、发展真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企图。”其对手尚能尊重与理解如许,当为我辈之鉴。

“场域”是由不同位置之间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的开放性结构,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场域”这个概念还有人通俗地翻译为“圈子”或“场”(布尔迪厄,2004)。

马尔萨斯在1798年第一版中《人口原理》中并没有多少内容涉及中国,但以后的版本里至少设有一章对中国的专门论述。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源于一场论战。作为法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及社会改革的倡导者葛德文在《人口原理》发表前一年曾出版《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认为贫穷的真正弊病不在于身体上的欠缺,而在于缺乏财富。但马尔萨斯对此持反对态度,把人口过剩作为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论据,遂匿名发表《人口原理》,与之抗衡。葛德文的这段原话转引自郭大力译马尔萨斯《人口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对马尔萨斯的激烈争论已持续了200年,未来还会继续激烈争论下去。公正评价马尔萨斯、解读其《人口原理》依然对社会科学发展及中国人口问题具有现实性指导意义。尽管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探索了一定的解决途径,表达了对真理的热爱、高尚的情操与积极的思想,代表了公正与民众精神。《人口原理》完全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思想价值与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宗正(1992):《评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第一版》,载于《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
2. 刘铮(1986):《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
3. 刘铮(2003):《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王建华(1992):《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研究的进展》,《西北人口》。
5. 乔晓春(1994):《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研究的几点意见》,《人口研究》,增刊。
6. 许涤新(1979):《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第1期。
7.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8. 李中清(2000):《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
9. 张洪方、王林山(2006):《关于马尔萨斯(Malthus)增长定律的研究》,《生物数学学报》,第4期。
10. 李中清等(2007):《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视角》,载于《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人口研究》编辑部(1998):《百年回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评价》,《人口研究》,第1期。
12. 冯立天(1998):《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批判的评判》,载于《人口研究》编辑部:《百年回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评价》,《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
13. 周雄兵(1998):《马尔萨斯人口论辨析》,载于《人口研究》编辑部:《百年回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评价》,《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
14. 王健康、万高潮(1997):《重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与经济》,第3期。
15. 穆光宗(1998):《穿过岁月迷雾:还马尔萨斯人口论以本来面目》,《科技导报》,第5期。
16. [英]马尔萨斯(1992):《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17. 仲明(2004):《从情报学角度看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情报资料工作》,第6期。
18. 张福生、沈斌华(1993):《马尔萨斯人口论辨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 王放勋(1978):《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 孙连成(1982):《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问题》,《学习与探索》,第4期。
21. Earl Babbie(2004),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0th edi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2. T. R. Malthus(1803/1992),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1803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T. R. Malthus(1826/1933),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Population, Or, 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 With An Inquiry into Our Prospecting the Future Removal or Mitigation of the Evils which it Occasions*. 1826 Edition. London: Ward, Lock & Co. Limited.

(责任编辑:朱 犁)

der the situation that enterprises' burdens of social security are overweigh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must be strengthened.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play more active roles in the respe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fundraising , and legislation.

Accessibility to Healthcare Resources and Farmers' Heal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Miao Yanqing ·47 ·

Based on a household survey in 46 villages of Jiangsu ,Shandong ,He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e paper describes health status and demands on healthcare in rural areas ,analyzes the effect of healthcare resources accessibility on health status using the Logit model. It concludes that access to healthcare resourc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ealth level. The strengthening of rural preventive care and improvement of village-level medical expertise are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Income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ealth status for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S on the Mortality Risk of China's Oldest Old

Shen Ke ·56 ·

Based on the four-wave datasets from Chinese Longitudinal Survey on Healthy Longevity ,conducted in 1998 ,2000 ,2002 and 2005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on the mortality risk of the oldest old. By cond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SES is partly mediated by adulthood SES , but not by health behavior. In additi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dulthood SES and health behavior ,father's occupation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influence on the mortality risk.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Skills

Song Guoxue ·64 ·

Based on customized generic model method ,this paper formulates the measurement index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as the base for investigat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study employs factor analysis to construct the dimensions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and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measurement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of graduates ,through which the signs of main dimensions could be analyzed. Besides that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gradua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employability skills among those graduat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items ,discrepancies of other skills are not visible except specialized skills. This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employability skil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raduates.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1949-2000

Li Yu ·73 ·

Using 2000 census data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trends and pattern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00. Results show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pouse's educational levels was stable or slightly decreased in early years ,but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he 1980s. Those changes in educational homogeneity were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the uniform association and the diagonal effec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 presents an unconventional argument that the strengthened educational homogamy was a result of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emerging market risk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indicat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ocial groups might become stronger in the last decades of 20th century.

Causes ,Ef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Yang Junchang Wang Xilong ·80 ·

This paper describ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Guangxi ,analyses the main factors and influences of the unbalance ,and addresses countermeasures to i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erious un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Guangxi is a latent danger of population security ,for this may highly negatively affec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the mutu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nationalities ,even endanger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the frontier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positive and active countermeasures on the matter in order to normalize the sex ratio at birth.

Rethinking about T. R. Malthus

Wang Cuntong ·86 ·

The book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uthored by T. R. Malthus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debatable masterpiec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mathematical demography methods to argue that the geometrical ratio and arithmetical ratio are correct and reasonable ,and discusse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to his theories. The article calls for giving this book comprehensive reconsideration.